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126
主管: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主办: 新华书店总店
协办: 中国图书馆学会

新华书馆报

CHINA LIBRARY WEEKLY

馆社之桥 人文之魂 阅读之美 书香之园



第541期

00 03-541

总第663期

2021年3月19日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第21期

天工开物序
天覆地载物序
因之曲成而不遺
於事物而免萬矣
其與築何萬
目成而後識之
其與築何萬

02 特别关注

两会代表委员建言古籍保护

03 图书推荐

为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助力

《书志》第二辑综述

04-05 历史钩沉

《天工开物》的守护与传承

写在《典籍里的中国·天工开物》开播之际

06 业界动态

首批向全国推荐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公布

07 理论园地

对古籍阅览服务工作的思考

08 书人书事

王重民整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善本揭秘

本报顾问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聂震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饶权(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
彭斐章(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吴慰慈(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本报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波(《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媛(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秘书长)
邓景康(清华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白雪华(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刘小琴(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任竞(重庆图书馆馆长)
孙月沐(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朱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刘宇松(贵州省图书馆原馆长)
汤更生(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长)
肖维平(首都图书馆党委书记)
何光伦(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
吴晔(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
张久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书记、主任)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李东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东莞图书馆馆长)
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
李国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李勇(河北省图书馆馆长)
李玉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杨建忠(化学工业出版社社长)
杨沛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
邱冠华(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陈超(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陈锐(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陈传夫(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陈胜利(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陈源燕(中宣部原出版局研究员)
周云岳(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宗俊峰(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林鹏(科学出版社总经理)
林旭东(安徽省图书馆馆长)
范并思(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
郑智明(福建省图书馆馆长)
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
柯平(南开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赵俊玲(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贾庆鹏(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徐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徐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索传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郭斌(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主任)
顾森(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褚树青(浙江图书馆馆长)
蔡继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
霍瑞娟(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魏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本报投稿邮箱
tushuguanbao@126.com

本报虚假失实报道举报电话
010-88361919
转载本报文章
请与本报联系并注明出处

两会代表委员建言古籍保护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环。在近日举行的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就古籍保护工作建言献策,以下呈现其中四位的精彩观点。

全国人大代表韩永进: 建设文化强国, 要让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图书馆理事韩永进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我重点关注的内容,就是‘文化’的力量。”

韩永进强调,应加强文化强国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文化强国指标体系研究。他建议,一方面,从今年开始,出版系列“文化强国蓝皮书”,将每一年为建成文化强国所做的工作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建设文化强国要重视发挥文献典籍的作用,让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今年大年初一,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讲了《尚书》,激起不少人对中国传统古典文献的热情。这实际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比如有一句吉祥话‘五福临门’,那么最早的‘五福’是哪五福?这就是《尚书》里提出来的‘向用五福’,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DNA,是一脉相承的。”韩永进说。

韩永进认为,典籍镌刻着中国之精神,民族之魂,是破解中华民族历史磨难而绵延发展的精神密码,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不仅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动力源泉。

韩永进强调,“我们要实现的文化强国应具有独特的自信,同时也是在国际视野中建成文化强国。”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 将典籍中的 优秀文化接过来传下去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典籍是承载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最主要载体。如何将典籍中的优秀文化接过来传下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提出建议:

一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提供有影响力冲击力的节目。大年初一,《典籍里的中国》热播,解读自古号称难读的《尚书》,让观众从故事、戏剧中感受典籍的魅力。同时国家图书馆和阅文集团合作将馆藏典籍中康熙、雍正、王羲之、颜真卿、赵孟頫等名家手书“福”字,配以当代技术结合的二次创作,借最通用的手机阅读方式进行推送,反响热烈。这提示我们在数字时代,用闲暇时间,让优秀传统文化“触手可及”,可潜移默化地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二是提供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产品。国家图书馆

联手蜻蜓FM制作的《故人·故纸》讲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故事,点击近百万次,亲子互动音频节目《伴随一生的古诗词》上线当日达到4万余次点击。在各种交通工具、购物场所频繁更换可视程度高的文化产品,公益推广,也可潜移默化中提升公民的阅读体验和文化素养。

三是提供更多的新媒体播放方式。新的技术、新媒体,在年轻群体拥有庞大的用户群,这个群体是未来文化强国的主体,对他们的下一代影响也大,一些诗词大赛受欢迎还与大中小学的课程相关。这些形式创新、与受众群体适配度高,前景向好。

四是建立长效机制。加大政府投入以及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形成供给,通过打造学习强国,成就文化强国。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将成为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全国人大代表郑晓幸: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

“全国现有的国有古籍文物修复师要抢救修复数千万册/件文物典籍,需要数百年的漫长岁月。”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郑晓幸说,大量古籍亟待抢救性保护修复,但我国从事古籍文献修复的专业修复师太少,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将造成一些珍贵典籍进一步损毁或消亡。

中华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留下了数千万册弥足珍贵的古籍文献资料,这些承载着灿烂的华夏文明、传承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的珍贵文物典籍,是国之文化宝藏,是培养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价值观、人生观,凝聚共筑中国梦磅礴力量的深厚滋养。而修复力量不足,大量弥足珍贵的文化和历史资料面临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危机。

郑晓幸建议,重视、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典籍保护,不断扩大修复力

量,加大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度。他说,社会力量指非国有、体制外的民办非企业机构,这是一支人数较多、实力较强的修复大军。

郑晓幸表示,克服专业修复师严重不足的短板措施就是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鼓励、支持、帮助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可采用民办公助的办法从政策层面上给予参与古籍保护有资质、有人才、有规模、有业绩、有信誉保障的社会力量以支持和帮助。

郑晓幸建议,对有资质参与古籍保护的社会力量实行政府采购、财政规划、定点扶持的帮扶政策,对有突出贡献的民办古籍修复保护机构和优秀技术人才给予奖励。建立古籍修复师职业资格制度,对修复师进行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稳定专业队伍,加快古籍保护进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全国政协委员唐旭东: 开展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

中医药古籍是中医理论、技术与文化内核的主要载体,也是我国数千年医疗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至今已成为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建议,开展国内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有关部门在重大科研立项和经费资助上加大力度,支持开展中医药古籍的资源普查,建立权威数据库,在5到10年内基本摸清中医古籍的家底。

几千年来,中医正是借助古籍文献的传承、按照符合自身规律的特殊模式发展至今。据目前不完全统计,现知存世的中医药古籍在国内馆藏有13000多种。尽管中国传统医籍的保护、整理、研究和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对中医药古籍资源的普查工作推动

缓慢,众多中医药古籍长期被束之高阁,尚未得到很好的整理研究和共享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医药遵循自身规律的创新性发展。

唐旭东建议成立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中心,推动开展全国古籍收藏单位的中医古籍资源调研,基本做到全国各省市县公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中医专业图书馆的全覆盖。在此基础上,推动制订《中医古籍分类标准》和《中医古籍著录规则》,对调研收集到的中医古籍书目信息进行统一规范化著录;整合上述资源普查成果,构建“全国中医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按照文化部颁发的《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对国内存世中医古籍进行系统全面的定级、定损,构建“中华医药古籍综合信息资源数据库”,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珍稀中医药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濒危中医药古籍的抢救性修复、经典中医药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为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助力

《书志》第二辑综述

□冯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书志》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系列丛刊,主要刊载海内外各收藏单位、研究机构和个人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古籍所撰写的书志,兼及其他揭示珍贵古籍或专题文献的书目、提要、访书记等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与书志学学术史回顾、书目提要编纂经验总结等相关内容,受“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重点资助。其书旨在揭示古籍细节、完善古籍著录、彰显古籍价值,从而深入梳理传统文化典籍、系统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向海内外各界宣传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亲近社会大众、服务学术研究。

《书志》第一辑20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自2021年起固定每年出版两辑。自第二辑起,设栏目如下:首为“书林论衡”,探讨书志类著作的发展历史、书志撰写体例要义、书志编纂经验总结等。本辑刊发严佐之《“开聚书之门径”“标读书之脉络”:论“藏书志”目录体制结构——以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为中心》、郑伟章《书山有路目为径,学海无涯录作舟——当今学子亟待读见各大图书馆撰出馆藏善本书志》二文,对书志体例辨析溯源,为书志编纂发出呼吁。《书志》主体内容为“国家珍贵古籍书志”栏目,刊载《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古籍的书志,本辑收入书志28篇,以《国家珍贵古籍书志体例(附释例)》为发端,作为《名录》书志的标准体例。此外又设“书目书志选刊”栏目,刊载以《国家珍贵古籍书志体例》为基础修订而成的特殊类型古籍书志,以及可揭示珍贵古籍细节及价值的其他文章,如书目、提要、访书记等。本辑刊载程佳羽、李际宁《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志(释家类)(二)》、王冕森《国家图书馆藏满文善本书志(谱牒类)》,及北京师范大学集体项目《现存元人著作(汉文部分)总目提要(续)》,分别详细描述大藏经及满文谱牒两类特殊文献,并对有元一代汉文著作分类撰述提要。

目录提要类著作,传统上详略不一,各有侧重,或称书录、藏书志,或称提要、解题等。它们发端自古,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着颇为切要的功用,不仅体现古籍存藏状况、评述古籍内容价值,而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中可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化面貌与学术脉络。近年来,编撰古籍善本书志逐渐受到海内外图书馆的关注和重视,出版面世的书志已有许多成果珠玉在前。在这个时候,回顾“藏书志”的发展历程,辨析其体制要义,或许可为我们总结当今工作、吸收新旧经验带来更深入的理解。

《书志》第二辑以严佐之先生论《爱日精庐藏书志》开篇,虽是旧文新读,但仍对书志编纂所关注的要素、面向的问题、发挥的功能等方面,具

有常新的意义。文章梳理目录学学术史,以《爱日精庐藏书志》为“藏书志”类目录发展的关键环节,顾千里谓其“必列某本旧新之优劣、钞刻之异同”,并“备载各家之序跋”,“复略就自叙校雠、考证、训诂、簿录、汇萃之所得,各发解题”,故能兼合众体,“开聚书之门径”“标读书之脉络”;同时呼吁后出书志效法其“书目”“题跋记”“解题”“辑录序跋”四者合一的结构完整性,兼顾古籍版本与内容,扩大信息承载,保持著录客观,全面揭示古籍的图书形式与内容特征。

对古籍进行详尽的客观著录,其价值不仅仅关乎对古籍本身的研究。古书刊刻、收藏、阅读、流转,携带着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信息。郑伟章先生在其文章中,以亲身经历呼吁各大图书馆撰出馆藏善本书志,因其收集汲古阁史料时发现,现有书目无法体现古籍编纂、校勘、刊刻、收藏等流程中的信息,尤其多忽略书中藏印,难以判断递藏源流,不得不广泛阅读,从数千种古籍之中大浪淘沙。而藏书印中往往也包含意想不到的信息——其体现书籍递藏,如冯文昌家藏宋本《金石录》十卷(今藏上海图书馆),刻“金石录十卷人家”白文长方印,其后递藏者如江立、朱文石、鲍廷博、阮元、汪诚、赵魏、韩泰华、潘祖荫等无不刻同一印文之印;其体现印主生平,如李慈铭有印“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可知其在科场每隔十年进一步,可谓艰辛而巧合。

实际上,我们知道,获取客观而准确的古籍信息,更多的功用应在其成规模效应之后。海量信息的系联与互证,可以织起一张细密的网,网罗起藏书史与文化史中无数节点。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古籍撰写书志,也是希望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典藏中,以最具价值、最为典型者为先导,探索古籍精细著录及其应用的可能。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由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现存珍贵古籍目录,旨在对我国现存古籍中具有重要文物价值、文献价值、艺术价值者予以重点保护,截至目前公布六批,全国487

家单位收藏的13026部古籍入选。《书志》第二辑公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制定的《国家珍贵古籍书志体例(附释例)》,适用于入选《名录》的汉文四部典籍。《体例》以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为原则,以第一辑所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汉文古籍书志样稿》为基础,整合近年撰写善本书志的实践经验修撰而成,附以释例。体例分为客观描述与考证按断两部分,其客观方面旨在为每一部古籍建立详尽的档案信息,详核古籍索书号、书名、著者、卷数、存缺、装帧、册数、版本、内容、行款、版式、尺寸、牌记、刊刻者、刻工写工、刊写题记、避讳、序跋、附录、批校、题跋、前后题款、钤印、递藏、书目著录及封面题签、杂写、点读标识等其他内容,附以书影,从细节上尽可能完整保存古籍的客观信息;与此同时,附按语于文末,为书志作者深入考辨留出空间,或可梳理古籍版本系统,或可稽考刊刻过程,或比勘补版、剜改、后印等版本信息,或针对古籍内容进行专业研究。本辑是《国家珍贵古籍书志体例》应用的第一次尝试,共收入书志28篇,其中20篇所录之书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述书志均归入“国家珍贵古籍书志”栏目,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出版年代由宋至清,包括稿本、批校本、名家题跋本等。一些较少披露的古籍,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莫友芝跋元至正八年建安日新堂刻本《春秋胡氏传纂疏》等善本珍刻,其完整信息借此机会得以公布。而一些久负盛名的经典古籍,也在撰写书志的过程中得以从书籍物质载体为出发点、以全书整体信息为描述对象,深入讨论古籍细节信息著录——如国内所藏两部宋刻本《咸淳临安志》,详析其卷帙离合与递经抄补;国家图书馆藏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首次释读书中所附清中期苏州文化圈名人的累累题跋与钤印;黄丕烈所跋诸名家词集,成批释读其品题,从中可见词类文献在藏书史上的流转及其地位的上升。诸如此类古籍信息,揭示越具体,梳理越完整,便越能为藏书史、阅读史及古籍内容研究提供丰满而坚实的资料。本辑所收书



志是一个开端,希望通过丛刊的尝试,引发更多古籍保护同仁的参与。

汉文四部典籍之外,《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入的其他类型古籍,如甲骨、简帛、敦煌遗书、金石拓本、舆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其他文字古籍等,尚需根据古籍特征,别撰体例。《书志》第二辑中,也通过两组书志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程佳羽、李际宁对国家图书馆藏24件刻、写本大藏详细著录,包括三件写本大藏及15件崇宁藏、6件毗卢藏经卷,大部分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写本公布每纸尺寸、刻本备录刻工及刊刻题记,并通过对比刻工、题记等信息,核实确定各经卷版本及是否补刻。王冕森则尝试用书志体例著录满文谱牒信息,从谱牒学的角度描述并分析六件国家图书馆藏满文谱牒,其中不乏整拜、纳兰性德这样的名人家谱,对谱牒形制、避讳制度、时人文化观念均作详细解读。本辑压轴之作《现存元人著作(汉文部分)总目提要(续)》与辑中大多数书志体例不同,以书的内容为核心,接续第一辑刊载,于本篇内介绍“经部易类”“子部杂家类”“集部总集类”三类元人著述,品评著述内容旨趣与学术源流。

书志对古籍的精细著录与全面揭示,是古籍保护工作经验的凝聚总结,也可为未来古籍数字化的信息组织打下基础,为各藏书单位编纂书目、提要提供借鉴。随着古籍普查及相关项目的深入开展,各收藏单位深入整理馆藏古籍、挖掘珍贵典籍特殊价值及古籍数据库建设等各方面需求日益突出。我们希望能借《书志》的平台,对图书馆工作、对文献学与书籍史的研究、对藏书文化与阅读风气做出一点有益的尝试,也希望能够通过《书志》的尝试,有更多同仁听到古籍字里行间无声的倾诉,帮助千年故纸走向新生。

《天工开物》的守护与传承

写在《典籍里的中国·天工开物》开播之际

□张志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3月7日晚,央视综合频道《典籍里的中国》第二集《天工开物》播出,继第一集《尚书》后,再次引起了全国广大电视观众的高度关注。

《典籍里的中国·天工开物》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入手,贯穿古今,把宋应星和袁隆平通过时空穿越联系在一起。宋应星“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五谷则麻、菽、麦、稷、黍。……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在古代中国,黄河流域最早进入农耕社会,种植五谷。到了明代,水稻已成为主要农作物,在解决生民温饱上发挥了主导作用。精耕细作,是明代土地开垦面积达到极限后,提高产量的唯一方法,也是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宋应星关注水稻栽培,《天工开物》把《稻》作为全书之首,记载了水稻品种、耕作方法、农具功用、稻灾防治、水利应用等。今天,袁隆平用杂交技术培育“超级水稻”,极大提高了产量,取得伟大成就。两位科学家以共同的追求,实现了跨越三个多世纪的“握手”。这个穿越和相知,产生了震撼效果,引起广大电视观众对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关注,逐步拉开了这部十七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序幕。

《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在明末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横空出世,随后在海外广泛传播,近代再次回归中国人的视野,为今日国人认识光大。虽然在清代中后期近200年间,《天工开物》几乎不被重视而湮于埋没,但在历代藏书家守护下,孤本传世,不曾断绝。

让我们走进历史,认识几位关键人物,了解一下《天工开物》在历史中不平凡的传承往事。

出版宋应星全部著述的
涂绍焯

宋应星有一位同代知音,不但与宋应星和宋应昇兄弟两次同科会试,还帮助宋应星刻印了《天工开物》,他就是涂绍焯(伯聚)。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崇祯十年(1637)刻本《天工开物》(以下简称“涂本”),就是涂绍焯出资刻印的。涂本存世不过三,珍稀孤罕,除国图这部外,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静嘉堂文库各有一部收藏。这三部典籍仿佛三座灯塔,在历史上分别照亮过中国、日本和欧洲,这是科技之光、文明之光,也是《天工开物》曾经传播世界的轨迹。

“伤哉,贫也!”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自序中谈起家境,无限感慨!祖上虽是宦宦之家,但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宋应星和长兄宋应昇多次会试落榜,贫无足资,不说刻印出版,连买书钱都拿不出来,更别提招请同人研讨所得了。他只有把平时所见所闻记录在方寸纸间。多亏同乡涂绍焯是位相契之友,在德行上追求完美,不但有伯乐之眼,还有古道侠肠,慨然出资帮他刻印书籍。崇祯九年(1636)刻印《画音归正》,崇祯十年(1637)又主动提出为他刻印《天工开物》。宋应星认为是夙缘所召,十分感激!可以说,没有涂绍焯的青眼义举,就没有宋应星《天工开物》的传世。

涂绍焯(约1582-1645),字伯聚,号映蔽,江西新建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与宋应星、宋应昇兄弟同科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殿试二甲第四十五名进士。先后任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吏部考功司郎中、提督四川学政、河南汝南兵备道、广西左布政使、云南巡抚等职,晚年讲学于南昌澹台祠,著《友教堂稿》。他与宋应星一家关系密切,经常过往研讨问题,抒发肺腑之言。由于涂绍焯外出任职,游历广泛,又主张开发西南矿藏,兴办工场,筹集辽东军需,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记载的不少西南矿产、工艺,也不排除有来自涂绍焯的介绍。明末商品经济发展,使得各地物产得以流通,知识得以更新,思想得以变化,文化得以融汇,这是宋应星《天工开物》问世时的社会环境。正如宋应星所言:“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科学家丁文江在《奉新宋长庚先生传》中也说道:

“先生(指宋应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磁,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

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关注农工技术的重要作用,成为当时先进中国人的追求。

明清鼎革之际,清军攻入江西。涂绍焯携家人出走,船行君山湖时遭遇大风,全家罹难。宋应星也守义自杀。这之后,宋应星避世隐居不出,再也没有新作刻印出版。明末清初战乱动荡,知识精英弃世湮灭,是社会的巨大倒退。涂绍焯罹难,终结了宋应星新著问世的可能。

1975年,《历史研究》刊登一则短讯《江西发现宋应星佚著四种》(以下简称《宋应星四种》)。其中说,江西省发现的明崇祯年间刻本《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是宋应星的重要政论著作和科学著作。《宋应星四种》的发现,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人们终于找到了《天工开物》之外的宋应星著述,对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笔者曾有幸目睹国图藏崇祯十年刻本《天工开物》和江西省图书馆收藏的《宋应星四种》。开卷可见,两书行款格式字体完全相同。每书前都有宋应星自序,而且都是在崇祯九年(1636)到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任职分宜县教谕时刊刻的。《论气》书口上写有“第八”,《谈天》书口上写有“第九”,应该就是宋应星已失传的《卮言十种》残篇。可以判断,《天工开物》《卮言十种》《画音归正》等都出于涂绍焯出资刻印,刻印时间就在崇祯九、十年间。考虑到涂本《天工开物》署为《天工开物卷》,其目录最末一叶后有被铲掉的文字,代之以墨条,正应宋应星在《自序》中所言“《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的记载。说明在刻印各书时,哪些内容合并、哪些内容单行并没考虑妥帖,“临梓删去”在所难免。书名情况的复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涂绍焯陆续索要宋应星著述,是希望汇总宋氏著述,一体刊刻。涂绍焯操作了宋应星著述问世的全过程。

发掘《天工开物》价值的
菅生堂、儒莲

涂本之后,明末清初间,书林杨素卿刊刻《天工开物》(以下简称杨本),“书林”多为建阳书商称号。书商刻印《天工开物》,说明当时社会对该书有需求,需求之一就是作为技术典籍、生财之书输往海外。原藏日本尊经阁、后归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部杨本,最早是加贺藩主前田纲纪的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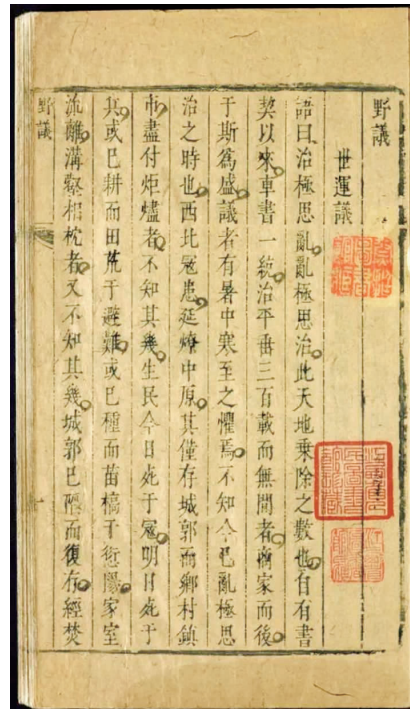
扉页上印有“书林杨素卿梓”字样,上面刻双行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就是把《天工开物》当作生财宝书出口海外的。国家图书馆现藏杨本,书上钤有“佐伯文库”印记。据潘吉星考证,“佐伯文库”是日本江户时代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于天明元年(1781)所设,说明这部典籍原在日本流传。国图藏杨本上还有“江南黎子鹤家藏书之章”,黎子鹤名世衡,早年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结业。这部典籍,一定是黎氏得自日本,携归国内。1965年,杨本由北京中国书店收购,同年售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目前杨本传世者只有三部,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台北史语所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中国图和台北史语所藏杨本都来自日本,说明杨本早已在国内失传,近代能从日本寻回,幸运之余,也令人叹息!

杨本之后,清代前期编修《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时也曾引用《天工开物》内容,此后再无人刊刻此书。《四库全书》也未收录《天工开物》。究其原因:一是书中多有犯讳,如《古今图书集成》引用《天工开物》,就把原书“北虏”一律改为“北边”;二是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自序》中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干也”,自然也不会受到清代士大夫和功名学子的关注。《天工开物》在不重视科技工艺的清代逐渐湮没无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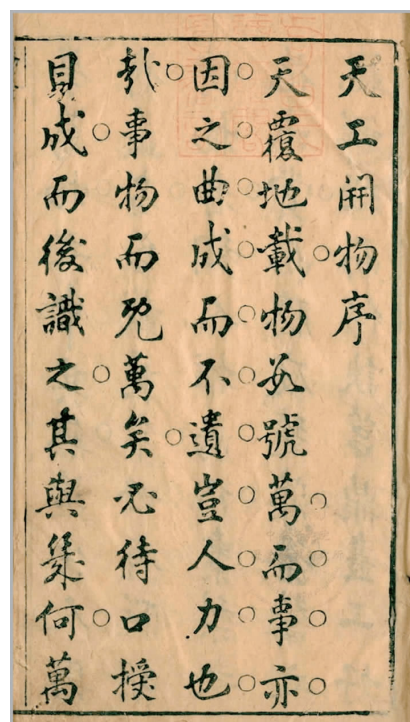
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天工开物》从清初陆续由中国商船运到日本口岸长崎,涂本、杨本都传入日本,学者竞相引用,名声大震。据潘吉星考证,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出版界就酝酿出版《天工开物》。明和四年(1767)九月,日本大阪传马町书林菅生堂主人柏原屋左兵卫提出发行《天工开物》的申请,同年十一月得到许可。开始因找不到善本作为底本,出版差点流产,后来从大阪著名藏书家木村孔恭处得到涂本,最终成功出版,使《天工开物》在江户时代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日本实学派学者佐藤信渊甚至依据宋应星《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他说:

“夫开物者,乃经营国土,开发物产,富饶宇内,养育万民之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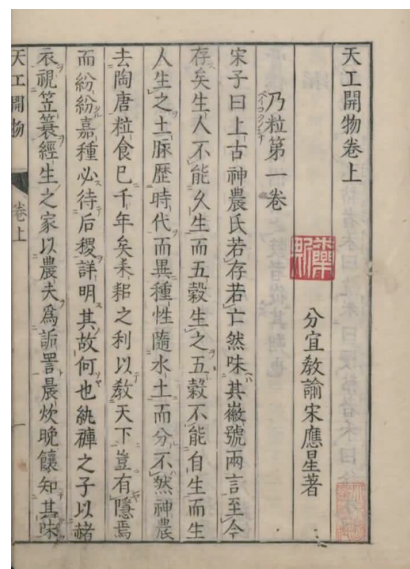
这种具有现代科学思想的思想对日本的强盛发挥了重要作用。菅生堂本在文政十三年(1830)曾经再版,广为流传,中外单位多有收藏。《天工开物》至此才不致从人间散佚流失。在保留《天工开物》上,日本学者和出版商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崇祯九年至十年(1636-1637)涂绍焯刻本(江西省图书馆藏)



明末清初书林杨素卿刻本《天工开物》(台北史语所藏)



日本明和八年(1771)大阪菅生堂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天工开物》价值的第二个发现地是欧洲。其中,法国巴黎皇家文库(今法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早在十八世纪即入藏《天工开物》涂本。被称为法国“汉学三杰”之一的儒莲(1797—1873)曾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和国王图书馆“助理馆员”之职,利用藏书之富、取用之便,陆续翻译了一批中国典籍,特别是《景德镇陶录》和《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资料。

儒莲称《天工开物》为“技术百科全书”,将“天工开物”四字理解为“对自然界奇妙作用和人的技艺的阐明”。他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陆续将《天工开物·丹青》论银朱部分和制墨及铜合金部分译成法文,开创了《天工开物》西译之始。

1837年,儒莲受工部和农商部委托,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及《授时通考·蚕桑门》译成法文,取汉名为《桑蚕辑要》,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该书提供了中国养蚕和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在欧洲引起轰动。达尔文称之为“权威性”著作,并在《物种起源》中把中国养蚕技术中有关内容作为人工选择、生物进化的重要例证。《桑蚕辑要》在不到十年间就从法文转译成七种文字,反复出版印刷,创造了汉籍西译史的空前纪录。此书帮助振兴了萎靡不振的欧洲桑蚕业。

欧洲从十二世纪开始造纸以来一直以麻纤维为原料。十八世纪以后,出版业发展,耗纸量激增,长时期出现造纸原料危机。1840年,儒莲将《天工开物·杀青》译成法文,提到中国用野生树皮、竹草和各种混合原料制浆造纸,引起法、英、德等国实业家高度重视,纷纷仿效,很快缓解了欧洲造纸原料危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代表作《幻灭》中,就描述了主人公大卫·夏赛在中国造纸术启发下试图改变造纸原料的故事。夏赛说:

“我们要解决的造纸问题,对于文学、科学、政治重要无比。”

“目前造纸还用破旧的苎麻布和亚麻布,这种原料很贵,法国出版业的大发展因此延迟了。”

“由于原料关系,中国纸一开始就胜过我们的纸。中国纸又薄又细洁,比我们的好多了,而且这些可贵的特点并不减少纸的韧性。”

“中国纸……是由捣碎的竹纤维做成纸浆。葛鲁贤神甫收藏一部附有说明全部制造过程的插图的论造纸技术的中国书。他指给我们纸坊里堆积的大量竹竿,图画得很细。”

巴尔扎克在《幻灭》中说的,正是欧洲人在《天工开物》中寻找新造纸原料的生动描述。

1869年,儒莲与科学家尚皮翁合作,译注《天工开物》部分篇章,发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就这样,儒莲把《天工开物》中的生产技术信息不断翻译出来,应用于实践,促进了欧洲的技术革新。

当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将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认为《天工开物》可与狄德罗主编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匹敌。20世纪后,《天工开物》的英、日全译本都得以出版。2011年,德国学者薛凤用英文写的《开万物之技艺·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在美国出版,介绍宋应星及其著作给人类留下的技术和精神遗产,引起当代西方学界对《天工开物》的热烈关注。

把《天工开物》和宋应星科学精神找回来的丁文江

当《天工开物》在日欧传播的时候,这部典籍的出版在国内中断了200余年。清末民初,伴随西学东渐,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宋应星和《天工开物》。1914年,丁文江考察云贵矿产,在昆明图书馆查阅《云南通志》时,偶然看到录自《天工开物》的炼铜内容,十分惊

喜!回到北京后,遍寻图书馆查阅该书未果。后从地质学者章鸿钊处得知日本帝国图书馆藏有《天工开物》。几年后,丁文江从罗振玉处看到一部残破的菅生堂刻本《天工开物》,听说陶湘有意翻印《天工开物》,便促成此事,陶湘寻找菅生堂本为底本,借日藏杨本为校本,用《古今图书集成》上的插图,1927年在天津出版了《天工开物》石印本。书端请罗振玉题字,书后丁文江作了3000字的跋文。从1914年到1927年,丁文江用13年寻找《天工开物》,终于使这部典籍重新回到国人视野中。丁文江充满激情的跋文,高度评价了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他说:

“三百年前言农工业书如此其详且备者,举世界无之,盖亦绝作也。”

“在有明一代……士大夫之心理内容,干燥荒芜,等于不毛之沙漠。宋氏独自辟门径,一反明儒陋习,就人民日用饮食器具而穷究本源。其识力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在丁文江眼里,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宋应星仿佛是独自穿越到“干燥荒芜”的明代社会。他阐述了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创作精神、求实精神、破除迷信精神,以及应用统计学、物理学、经济学观念的特点,并列举书中事例加以说明。丁文江还在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翻阅大量方志,哀辑宋应星兄弟事迹。在《奉新宋长庚先生传》中,丁文江对《天工开物》传承之艰难慨叹道:

“先生之学,其精神与近世科学方法相暗合。乃身遭国变,著作沦散,非邻国流传,天幸遇合,则毕生之业将没世而无闻矣,悲夫!”

丁文江是《天工开物》价值的发现者,也是宋应星科学思想、求实精神的推崇者,是宋应星真正的“知音”。他把宋应星和《天工开物》重新请回中国,使这盏孤灯终于变成无数星火。中国知识分子素以爱国、奉献、吃苦、求实精神著称。傅斯年评价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是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我想,这也是从宋应星到丁文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在贫困战乱中守护孤典的蔡鸿鉴、李庆城、蔡敬襄

清中期以后,宋应星《天工开物》早已不在国内传播,但收藏者仍然坚持不懈,守护着宋应星著述中仅存的两盏孤灯。

宁波藏书家蔡鸿鉴,父辈以经商起家。鸿鉴雅好藏书,以所居墨海楼(一作墨懈楼)储书,先后收集了镇海姚燮大梅山馆藏书、抱经楼卢氏藏书,以及因太平天国战乱中落的江浙巨家大户的藏书2万余册。鸿鉴去世后,其子蔡和霖继承父志,又先后购藏200种5000册明代典籍,自号其藏书处为“明存阁”。蔡和霖去世后,墨海楼书2879种30441册抵押给甬上李氏,其中就有国内仅存的《天工开物》涂本。李氏建葶荫楼典藏群书。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历史阶段。宁波藏书家们细心守护着《天工开物》,使其渡过了多重艰难险阻。1951年,李氏嗣子李庆城将全部古籍捐献国家,虔藏于浙江图书馆。其中涂本《天工开物》,在郑振铎专门安排下,调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由国家典藏。

现收藏于江西省图书馆的明崇祯刻本《宋应星四种》,堪称海内外孤本,在传承中也历尽艰险。这部典籍在历史上的流传并不清晰,只知民国时江西新建藏书家蔡敬襄视学江西分宜县时获得并收藏(《宋应星四种》在崇祯间刻印时,宋应星正在分宜担任教谕)。蔡敬襄(1877—1952),号蔚挺,是近代著名教育家。1905年,他在清末保守观念十分顽固时,毅然创办江西义务女子学校。因教育经费难以为继,蔡敬襄断指血书誓保女学,

登报后得到社会广泛捐助,把江西女学办成典范。蔡敬襄又在学校南隅创建蔚挺图书馆,将多年收集的地方志、乡邦文献、金石文字等万余册,以及矿物标本百种收纳其间,向公众开放,享誉赣省。据毛静、刘禄山等人研究,蔡敬襄的蔚挺图书馆有3件镇馆之宝,其中就有《宋应星四种》。蔚挺图书馆在战乱中历经坎坷、勉强维持。日寇占领南昌7年间,女校被烧成焦土,蔚挺图书馆留守者趁乱监守自盗,抗战胜利蔡敬襄回来时已是人去楼空。幸而他在1938年撤往赣州时将部分珍贵典籍随行携带,幸免于难。他赋诗说:“监守不忠被盗尽,伤心亦是劫同遭。”深感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1952年,蔡敬襄临终嘱咐将全部收藏捐献国家。《宋应星四种》由此入藏江西省图书馆。翻开这部海内外孤本,在《野议·自序》后面不知哪位收藏者用墨笔书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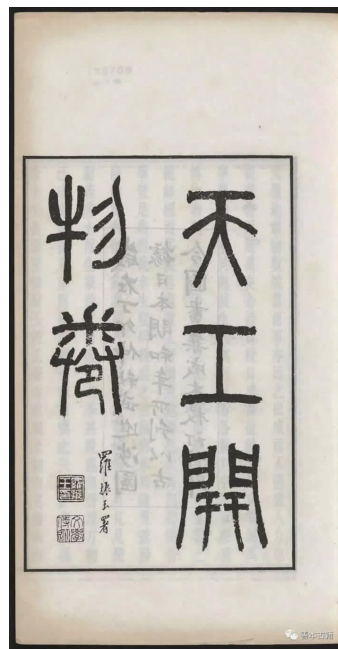
“书有益、有无益者,穷理有得,传之后世。”

也许正是这句话,使这部“穷理有得”的“有益”典籍传了下来。我们体味收藏者的苦心孤诣和艰辛历程,心中怎能不油然而升起对这些典籍守护人的崇敬之情呢。

如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了《天工开物》涂本和《宋应星四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中还影印出版了简装《天工开物》涂本,以低廉价格广布大专院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涂本、杨本制作成数字影像,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上为普罗大众提供公益服务。秘本走出册府,实现了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宗旨,宋应星著述最终得到了安全传承。

《天工开物》卓越研究者潘吉星

在现代科学史家里,潘吉星可谓国内研究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翘楚,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绩。潘吉星之研究宋应星和《天工开物》,最初是受了《天工开物》日本译者数内清的影响。数内清对宋应星评价很高,和李约瑟一样,他认为宋应星可以与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代表人物、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狄德罗相比。狄德罗的书里面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科技文化,这激起了潘吉星研究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兴趣。他亲自去江西考察宋应星生活的地方,沿着宋应星的足迹探访传统工艺,拍照做笔记,再带着问题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了大量有用史料,弄清了宋应星的家族、生平和交谊。看到《天工开物》中记录的“浏阳早稻”至今仍在种植,潘吉星非常兴奋,他提议在中科院成立宋应星研究组,组织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分工负责不同篇章,从专业角度对《天工开物》整理、今译、注释。潘吉星还不断挖掘新资料,了解宋应星其他著述存世情况。这些基础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潘吉星先后撰写了《明代科学家宋应星》(1981年科学版)、《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1989年巴蜀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宋应星评传》(1990年南大版)、《天工开物译注》(2008年上古版)、《天工开物导读》(2009年中广电版)、《天工开物》(2011年中广电版)、《天工开物》(2011年广东教育版)、《宋应星评传》(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的故事》(2012年吉林科技版)等著作和科普书籍,并系统研究了《天工开物》的版本、宋应星的财富观、巴尔扎克笔下的《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等。他还在《中国造纸史》《中国火箭史》《中国火药史》等著作中引述对宋应星《天工开物》和《宋应星四种》的研究成果。他在平生最后一部巨著《中国火药史》中,引用《论气》来证明宋应星注重研究火药爆炸的原理,认为宋应星的“气说”超过他同时代西方的“药素说”。靠熟练运用多种语言文字,潘吉星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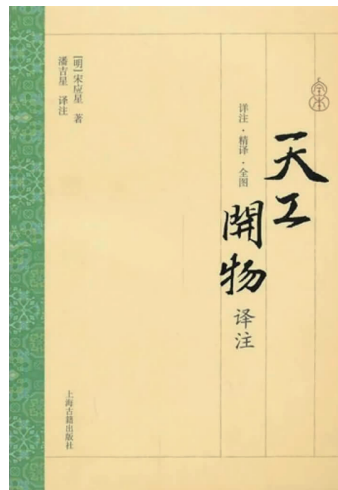
罗振玉题名“天工开物卷”



儒莲



丁文江



潘吉星《天工开物译注》

首批向全国推荐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公布

本报讯 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消息,3月3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

为进一步规范古籍普及工作,充分发挥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

为广大读者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要之书”“最善之本”。首批向全国推荐的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予以公布。

据介绍,首批推荐的经典古籍为具有较强典范性、传承性的古代文化典籍,其中既包括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核心理念的原典,也涵盖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名家名作。推荐的

经典古籍优秀整理版本遵循古籍整理出版规范,所据底本精善,校勘精良,注译准确,质量上乘,覆盖文本整理本、高级读本、一般读本和选本等多种类型,注重普及,兼顾提高,努力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强调,此次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历经前期调研、版本征集、专家初评、样书征集、

专家终评等多个环节,始终坚持专家评价、群众认可、市场检验相统一的原则。下一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将认真总结经验,创新工作方法,形成分批分次推荐的长效工作机制,成熟一批公布一批,将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推向深入。

这40种经典古籍包括:《尚书》《周易》《诗经》《礼记》《左传》

《论语》《孟子》《说文解字》《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水经注》《管子》《老子》《墨子》《孙子兵法》《庄子》《荀子》《韩非子》《世说新语》《楚辞》《文选》《文心雕龙》《陶渊明集》《李白集》《杜甫集》《韩愈集》《柳宗元集》《苏轼集》《辛弃疾集》《李清照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厢记》《牡丹亭》。

“册府千华”古籍特展在苏图展出

本报讯 3月16日,“册府千华——苏州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对外展出。“册府千华”系列展览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古籍展览之一,这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苏州图书馆(苏州市古籍保护中心)承办,常熟市图书馆、吴江区图书馆、苏州博物馆、吴中区图书馆、常熟博物馆等古籍收藏单位合办。

展览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吴刻最善”,介绍苏州刻书的历史与成就;第二部分“吴门缥緗”,展示苏州市各藏书单位收藏的珍贵古籍;第三部分“吴韵流长”,介绍十家重点藏书单位开展的古籍保护工作。

苏州号称文献渊薮,是我国

古代藏书、刻书中心之一。明清两代,阊门、观前街一带,书坊林立,现在能找到名字的书坊就有几百家之多,所刻之书更是难计其数。而且苏州所刻之书,以校勘精审著称,虽然价格高,却深得读书人的喜爱。明代藏书家胡应麟就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752部)中,苏州图书馆有5部古籍入选,包括明前期刻本《贾谊新书》三卷、明崇祯七年程应祥刻铃印本《印范》一卷、明万历四十五年刻铃印本《苏氏印略》三卷、清初带古堂刻铃印本《胡氏篆草》一卷。苏州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的古籍共达124部,在江苏省内仅次于南京图书馆,位居全国同类图书馆前列。

苏州博物馆古籍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有10万余册(含卷轴、册页等),大部分属于民国以前的线装刻本及稿、抄、校本,虽不云多,亦可曰精善,尤其是佛教经卷、地方文献、碑帖拓片、名人手稿等,均为极富特色的馆藏佳品。在2007年开展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中,苏州博物馆有56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27种入选《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其中不乏历史文献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俱佳的珍品。其中,五代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北宋写本《佛说天地八阳经》、北宋刻本《金光明经》等56种古籍,先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图片报道



本报讯 近日,一场主题为“折汉服、学汉语”的汉语公开课在湖南图书馆国学堂生动开讲。这是湖南图书馆“湘图汉语角”活动首次针对在湘外籍人士举办汉语学习活动。来自长沙理工大学的冀文秀老师紧紧围绕中国汉服“上衣下裳”的风格特点,详细讲述了汉服的初创渊源、发展历程以及相应的文化观念,并细心准备了两套汉服实物邀请国际友人试穿。相比之下,折纸汉服的手工体验环节则更为热闹,老师熟练地操作着剪刀和纸张,演示具体的制作流程,同时也频频与国外友人互动,引导他们一起动手参与体验“汉服制造”的快乐。“湘图汉语角”是湖南图书馆的特色品牌活动之一,曾组织众多在湘外籍人士参与了非遗、京剧、民乐、中华传统节日等主题体验活动,反响热烈,广受欢迎。



本报讯 新的一年,疫情渐渐消散,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辽宁省营口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小夫子公益讲堂重新开课。3月6日,在营口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一楼的童学书院开启了生活礼仪的课程,通过文字、视频、互动等方式,讲述碗、筷的历史典故和风俗习惯,小读者们一起学习餐桌礼仪。老师幽默诙谐的讲解,使课堂氛围轻松愉快,时而理论讲解,时而实际操作,时而小读者们相互讨论,时而向老师探讨研究。小读者在小夫子公益讲堂上既学到了生活礼仪知识,又积累了生活礼仪常识,家长们纷纷表示希望能够多多参与,提升孩子自身的综合素质。营口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中,以专业的国学课程为基础,培养、指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与辰山植物园共建研究生实践基地

本报讯 3月12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文物保护创新研究院上海辰山植物园古籍保护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正式揭牌。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与辰山植物园将会建立密切、长久及融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各自研究内容和资源特色,计划在传统造纸植物调查、培育、检测和文献学研究,纸质文献修复保护的科普与展览,科技成果转化及研究生培养等领域开展强强合作,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揭牌仪式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杨玉良以“中国传统手工纸的化学与物理”为题开展讲座。讲座从人类的书写材料切入,对中外书写工具和纸张的特点加以阐述,指出造纸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手工纸寿命长,在保存典籍、传承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手工造纸行业受到西方造纸技术的冲击而面临窘境,传统手工纸工艺的恢复和研发势在必行。杨



玉良着重介绍了传统造纸的物理、生物、化学等科学问题,内容涉及生物酶漂白、科技延长纸张寿命等多个方面,对古籍科技保护提出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

石家庄图书馆举办红色妇女运动文献展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石家庄图书馆近日联合感动省城十大人物、河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律,在新馆举办了系列红色收藏展。系列展根据不同时间节点,推出不同内容、各具特色的红色主题珍贵藏品,为党的生日献礼。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期间,展出了百余件红色妇女运动珍贵文献,展览将持续到3月底。

本次展览分为巾帼元勋、革命烈士、妇女英模、文艺女兵、燕赵女杰、艺术形象、妇联成立、妇运丛书、婚姻法律、妇女报刊十个部分。

其中1938年《新华日报》三八妇女节特刊、1948年《晋绥边区婚姻条例》、1949年《新中国妇女》创刊号(封面为石家庄大兴纱厂女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献》、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出版的各种妇女英烈人物著作版本,都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和红色收藏价值。

红色文化学者王律通过多年搜集西柏坡时期妇女运动的红色文献,总结归纳出石家庄妇女运动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

转折时刻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比如:中央妇委在平山东柏坡筹备成立全民主国妇女联合会,为新中国妇女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组织编写《妇运丛书》,从西柏坡选派代表出席国际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提高了中国妇女在国际上的地位;着手起草第一部《婚姻法》,为新中国妇女婚姻自由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证等。

此次展出的解放区报刊、早期著作中不乏革命文物级的珍藏,见证了新中国妇女事业从这里走来的辉煌历史。

对古籍阅览服务工作的思考

□沈艳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古籍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工作也在不断加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笔者从事古籍阅览一线服务工作,对传统文化热度的感知是非常直观和具体的。

一是研究主体逐渐扩大。古籍阅览室的读者仍以高校和科研人员为主,但是公务员、出版机构、古籍爱好者也在日益增多。高校和科研人员是阅览室最大、最稳定的读者群体,他们一般是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和从事专业教学的教师及研究生。他们来图书馆的目的很明确,即为了完成自己从事的专职工作或是相关研究课题来查询资料,其特点是专业性、阅读量大、注重古籍文本的原始面貌。

但是同时,另一些相对分散、独立的读者群体正在慢慢形成,比如公务员、出版机构和古籍爱好者。公务员较多的是地方文献资料部门,例如地方史志办、方志办、党史研究室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工作中需要用到一些国图馆藏的古籍文献。这类读者的需求通常是要把资料作为地方历史文献资料留存到当地,所以申请复制的比较多。而随着古籍整理和出版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参与到古籍出版项目中,为了选取更好的古籍版本,他们需要来图书馆查阅、核实版本,商洽出版事宜。随着古籍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古籍爱好者的比重也不容小觑。很多普通民众对古籍产生了浓厚兴趣。阅览室接待的读者中有一部分就是对古籍慕名而来,或者是对书法、戏曲、中医等某个领域的内容感兴趣,希望查阅相关的书籍。这一类型的读者往往没有特别明确的书目需求,也不追求特定的古籍版本,利用中华再造善本、缩微胶卷等复制件就可满足其使用。

二是服务需求逐步变化。以前的古籍阅览室服务内容以单一阅览为主,现在复制和专业咨询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一般而言,专业读者使用古籍的目的主要有三个:学术研究、书影出版、点校整理。基于这三个使用目的,读者不仅需要阅览古籍,通常还需要复制。古籍的复制一般是指缩微胶卷还原和原件扫描。读者对复制有不同需求,有的用来比对版本,有的研究批校题跋,有的用印章、插图做书影,直观地表现出了古籍研究方向的不断细化和利用古籍的多样性。

古籍文献专业咨询的工作也正在展开。这项工作的初衷是一些研究人员遇到困难,必须借助文献本身才能解决,但是因为某些客观原因,他们无法来到阅览室查阅或者文献本身的状态不适宜对外提供阅览,这种情况下,读者可以寻求阅览室工作人员的帮助,把他们关于文献的具体问题记录下来,由工作人员代为查看文献,并作出专业、准确的回复。

三是利用的文献范围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小众、稀见文献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随着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和众多古籍目录的整理出版,很多稀见却珍贵的古籍日渐进入研究人员的视野,但是这种古籍往往不易获得,国家图书馆馆藏了大量的珍贵稀见文献,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藏。另外,中华古籍浩如烟海,已经被发现、受重视的文献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大量未被开发的古籍文献成为了研究人员的目标。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品正在逐渐走出库房,得到新的利用。例如《誓天纪实》一书,是清末爱国人士蔡钧的稿本,查文献资料很少能看到关于此书的资料,但是近两年有一些科研人员前来阅览,说明对此书的研究正在逐渐展开。

面对新形势,古籍阅览室的服务也在与时俱进,作出相应调整,在制度框架内,尽最大的可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一是在遵守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馆读者提供便利。有些外地读者匆匆赶来要阅览原件,但事先不知道要带介绍信,我们不能简单地拒之门外,作为变通之法,可让其单位开具介绍信后拍照发过来,我们打印出来使用;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人,凭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为其办理审批事项,尽可能简便程序;若遇到研究人员需要查阅的文献有复制件,原则上不提供原件阅览的情况,我们会根据情况酌情对待,如确实是对纸张、墨色这些只能依靠原件来判断的信息进行研究,我们会为其做特别申请,尽量满足科研的需求。

二是通过电话和邮箱开展远程服务,依托电子数据库等网络资源提供文献。新形势下,图书馆的配套设施、技术方法和服务模式都在不断更新,善本阅览室也必须创新服务形式,电话、邮件等远程服务更加顺畅。通过完善古籍数据库、利用馆外网络资源、使用网络通信软件等手段,将善本阅览室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古籍文献资料信息服务中心。

为此,我们设立专门的读者咨询邮箱。因为古籍的年代版本不同,内容也大不相同,所以确定一种古籍需要提供详细的版本信息,读者提供的信息越详细,工作人员检索的结果越准

确。以前的读者咨询多以电话为主,但单靠语言有时候难以描述清楚读者需求。通过邮件,读者可以文字+图像的方式,将自己的需求最大程度地表达出来,便于工作人员准确理解,精准服务。经统计,读者咨询邮件多以查询某一种古籍是否在国图馆藏,能否阅览、复制为主。还有一些邮件咨询是读者要求确认古籍中某一章节或者某一叶的信息,工作人员需要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锁定具体文献后,代为查看,如此便可让读者足不出户获取相应信息。

三是根据不同层次读者需求特点,不断深化专题咨询工作。善于分析读者阅读层次,提供针对性的古籍咨询服务,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是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趋势。因此,古籍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对于不同层次、背景的读者,更要量体裁衣、有的放矢地开展个性化服务。

专业古籍研究人员具备检索和辨别不同版本的能力,他们咨询的问题往往更加深入,所需要的是专业性更强的解答。例如有读者来邮件咨询《楚辞述注》一书,因为国图藏本与其手头的版本略有出入,所以需要核实三个序的内容和顺序、版式大小以及部分章节具体页面的文字内容是否一致。工作人员需对照原书,逐字逐句地为其核实,并作出准确回复。

普通古籍爱好者对古籍及藏书文化充满兴趣,但大部分并不太了解古籍,不具备古籍专业知识,这部分读者需要工作人员帮助其条分缕析,弄清其阅览目的。比如一位预约善本特藏阅览室的读者,并不清楚古籍善本的定义,也不清楚自己要查找哪种古籍。工作人员经过仔细询问,得知他要查找最早关于机械的记载,再根据他的需要,提出在子部书籍里查找,并手把手地教他检索方法,最终在“子部·术数类”和“子部·杂著类”里找到了相关文献,获得了读者的好评。针对古籍爱好者的咨询工作,不仅解决了读者的问题,也在无形中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虽然阅览室在不断尝试、努力改善读者的服务体验,但是在读者日益增加的文献获取需求和图书馆文献保护的职责之间,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导致一些读者不理解、有怨言。针对这些情况,阅览室服务工作要提高站位,把握新形势下古籍阅览服务的特点,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继续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在服务形式、服务内容、服务手段等方面挖掘新的潜力。

古籍阅览室除了继续承担文献阅览、文献提供的任务外,还应满足各种类型读者业余文化和教育学习的多方需求。由于古籍善本的特殊性,相关工作人员除了向古籍读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一般文献信息外,还肩负着向读者介绍古籍相关知识及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未来的图书馆既是一个文化和教育的基地,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的集散地,图书馆对读者提供的将是“多元文化信息服务”。

古籍善本数字资源作为新型的便于利用的资源形式,不断改变着人们阅读古籍的习惯。古籍阅览服务要多向读者介绍古籍特色数据库,方便读者远程阅览,如“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古籍”“中华再造善本”“馆藏石刻拓片数字化资源”“数字方志”等。特别是在这次疫情期间,这些数据库和远程服务方式发挥了重大作用,实现了快捷、安全、多元化的读者服务方式,在读者中引起积极的反响。如何充分发挥古籍数据库的作用,在保证古籍安全的情况下,提高准确性,不断扩大其影响,如何为更大范围的读者提供相关服务,是我们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另外,新时期图书馆界倡导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资源共享”,因此古籍阅览室仅仅凭借本馆古籍书库的资源来服务读者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放眼全国甚至全世界,充分利用馆外资源来提升服务的广度。

阅览古籍的读者群体普遍知识层次较高,咨询专业问题数量多,这对阅览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对学生阅览工作了如指掌,还要对馆藏古籍的情况、馆内其他服务等有更多的了解。遇到读者的咨询,实行首问负责制,能够回答的当场给出答复,若有疑问也要尽快咨询专业科组之后回答读者。要想读者之所想,为读者节约时间。实行人性化服务,最重要的是把读者需求放在第一位,同读者建立相互尊重、彼此信任的关系。满足读者阅览和咨询需求,及时解决读者阅览中遇到的困难,帮助读者最大程度地获取所需文献和信息。

此外,工作人员应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具备强大的古籍专业知识,这样在面对读者的各种专业问题时,才能游刃有余。古籍文献价值和资料价值较高,版本信息确认难度较大,要为读者提供专业的古籍咨询,必须对古籍校勘、古典文献、古籍版本知识、古籍流传溯源等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工作人员在接到读者咨询之后,要自己做好“功课”,尽可能地对接咨询的研究对象和背景进行了解,最大限度地搜寻馆内外的相关古籍文献和配套的当代研究性资料,以便为读者提供准确有效的答复。在自身专业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还需借助部门专业研究力量,及时为读者提供所需服务。此外,工作人员不能被动地应对读者的需求,而要主动出击,将平时工作中的发现和积累进行系统总结,利用大数据思维分析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指导日常服务工作。

王重民整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东亚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善本揭秘

□姚伯岳 凌一鸣(天津师范大学)

1945-1947年间,王重民应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孙念礼之邀,利用本人休假时间4次到馆进行古籍鉴定整理工作,并撰写完成了该馆历史上第一部馆藏中文善本书录。但由于相关资料记载的缺乏,此事始末一直模糊不清。本文作者通过整理该校所藏王重民书录手稿与近70通相关信札等档案资料,厘清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将王重民书录手稿与后来出版的屈万里所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做了比较,证明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加工的产物。



王重民

抗日战争期间,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虽然人在国外,但一直心系祖国,为抢救和整理中国古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1942年6月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的2700多部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所藏中国善本古籍全部拍摄了缩微胶卷,并一一撰写了内容详尽的提要;同时还完成了包含1600余条提要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工作量巨大,工作效率惊人。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美期间,王重民居然还帮助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鉴定整理了该馆所藏丰富的中国善本古籍,并撰写了一千多条提要。该馆将王重民的提要手稿装订为精装4册珍藏,直至今日,国内仅有少数人亲眼见过。

1983年,由王重民夫人刘修业整理、王重民撰著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二书共收提要5000余种,范围包括国立北平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中国善本古籍,但没有收录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刘修业在《中国善本书提要》的“后记”中写道:“有三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撰葛思德文库的中国善本书提要,虽有一千种,但因未全部编完该文库所藏中国古籍,他的原稿又留在美国,后由屈万里先生删补修订,在一九七五年出版,名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文库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史料记载,王重民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鉴定整理其馆藏善本古籍的情况对学界来讲一直是个谜。2019年11月至次年6月,笔者之一、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师凌一鸣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访学,不仅有幸将王重民当年所编该馆善本提要手稿4册日夜摩挲,还在东亚图书馆现任馆长何义壮与中文编目员曹淑文的帮助下,得见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墨德手稿图书馆第415号箱的王重民与孙念礼、尤桐等人相关通信近70通。这些信札反映了王重民与普林斯顿方面接洽、沟通及合作的全过程,是关于王重民这次古籍鉴定整理活动的第一手资料。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书概况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前身,它的藏书是基于企业家葛思德(1864-1948)的私人收藏发展而来。葛思德是美国葛氏工程公司的创始人,因罹患眼疾多方求医无效,后在好友义理寿(1875-1948)介绍下用中药治愈,由此对中国典籍与文化产生浓厚

兴趣而开始大量收藏中国古籍。

1926年,为妥善保管其藏书,葛思德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馆长格哈德·洛默接洽,在麦吉尔大学建立葛思德华文书库,1931年更名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1936年10月,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转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合作,从加拿大蒙特利尔迁入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到1940年,馆藏1911年以前的中文古籍已达5000种,逾10万册。不仅数量上在北美堪称大宗,在内容上也极具特色,得到世界汉学界的高度重视。

王重民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关系

促成王重民为葛馆鉴定整理古籍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尤桐。王重民与尤桐是北京师范大学同学,私交甚笃。1940-1941年间,尤桐在葛馆工作,并担任馆长孙念礼(1881-1966)的助理。孙念礼为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汉学家。她于192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第一位取得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女学者。

1941年9月,王重民受张君劭委托,为张氏1939年冬于大理创建的民族文化书院征求藏书。王重民通过尤桐向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提议,在普林斯顿大学与民族文化书院间开展书籍交换项目。孙念礼积极予以配合。在这次合作中,王重民的严谨、认真、热心和工作能力给孙念礼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5年5月15日,孙念礼向王重民发出了赴葛馆工作的正式邀请,请其审查馆藏目录。王重民于1945年5月17日的回信中接受了邀请,并根据自己在国会图书馆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工作计划,希望编一部与《国会图书馆藏善本书录》一样的善本书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重民到葛馆工作完全是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并不是一种工作派遣,这充分说明王重民在美期间的工作量是如何之大。

王重民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时间

根据各种记载,为鉴定整理葛馆藏书,王重民共4次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第一次是在1945年7月8日或9日,王重民从华盛顿到纽约先与胡适、尤桐相聚,随后在尤桐的陪同下,到普林斯顿大学礼节性拜访了孙念礼,当天就立刻返回华盛顿了。

第二次是1945年12月15日到1946年1月7日,审查了馆藏经部全部及集部的三

分之二明刻本。在美国人的圣诞假期,王重民却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而且乐此不疲。所以短短3周便完成了将近一半的鉴定和记录工作。

第三次是在1946年3月15-23日,这次他是带着夫人和孩子一同前来。此次编目,他对前次已编书进行了核对,并编完了集部善本书。

第四次是从1946年12月22日起到次年1月底,最终完成了葛馆所藏经、史、子、集四部所有古籍善本1036种的审查与书录编纂工作,整理完成的提要手稿则留在了葛馆。临走的前一日,王重民写信给已经回国的胡适说:“重民等明晚离华府,二月十四日由旧金山乘Marine Hynx返国,二月底抵沪,三月十七日以前,一定能赶到北平上课了!……重民今天把国会工作,作到一清百了!Princeton有善本九百六十种,亦编成二目。在美任务,结束亦自满意。”

从1945年7月8日到1947年1月底共3个年头,除第一次到普林斯顿大学会晤孙念礼属礼节性拜访之外,王重民总计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工作了2个月有余,用实地考察记录和异地整理清缮相结合的方法,最终完成了葛馆所藏中国善本古籍的提要撰写任务。

王撰提要为何没有出版

王重民为葛馆编撰的提要手稿采用西式精装形式订为4册,沿用该馆旧目之例,按经、史、子、集编为A、B、C、D四类。该手稿一直没有出版,甚至没有确定的书名。笔者拟将其中文书名定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善本书录》,《王录》迄未出版,笔者揣想有多重原因。

第一是当时美国没有出版中文书的条件,只能联系中国的出版机构出版。然而此时国内局势不稳,百事维艰,无望在中国出版。

第二个原因是,《王录》只是一个初稿,此后葛馆工作者陆续对该书录进行了审校工作。首先进行审校工作的是与王重民合作的孙念礼。在孙念礼之后继任馆长的胡适也对《王录》做了审校。胡适对《王录》的审校工作,纠正了《王录》中的一些错误,但有些批注也未必正确。不过这样一来,就打消了该馆后来的主政者直接出版《王录》手稿的念头,转而采取再聘专家对《王录》予以进一步审核的做法。

《屈志》与《王录》的关系

1965年,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屈万里受普

大图图书馆馆长威廉·迪克斯(1910-1978)与历史系教授牟复礼(1922-2005)之邀赴美访学,在时任普大图图书馆东部主任童世纲(1911-1982)的帮助下,对葛馆馆藏古籍善本进行了又一次的审查。在屈万里开始工作之前,馆方向其提供了《王录》手稿供其参考。

屈万里说:“王重民原稿的体例和他所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书志》一样……有改变体例的必要”,“又因王重民的原稿系仓促间编成,错误的、遗漏的、应补充的和应删汰的地方颇多,于是干脆就把原稿放下,而重新作了一部”。

事实是否如此呢?屈万里所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有两部手稿,今均存藏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据笔者目验,《屈志》初稿本是在《王录》复印本之上用蓝色钢笔进行增删改易而成;第二稿是对初稿本进行誊写调整形成定稿本。经笔者核对,《屈志》定稿本大多数篇目基本上是誊录《王录》文字,其著录内容、考证结论尤其是版本判断大多沿用《王录》,是对《王录》的加工和改进。正式出版后,《屈志》成为海内外学者了解与利用葛馆馆藏的重要途径。

令人感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从1945年7月至1947年1月,王重民在本职工作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4次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在总计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以极高的效率,进行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中国善本古籍的鉴定整理工作,完成了包括1036条善本提要的撰写任务,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留下了一部整齐装订为4册的善本书录手稿。他的手稿虽迄未出版,却为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的屈万里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勤勉的治学态度,给国外的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保护流散海外中国古籍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更让我们感动、感奋。